



非遗中国年“出海”的三重价值意蕴

张慧婧 张申重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这为非遗的当代传播提供了理论指引与实践路径。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既是承载千年文明基因的文化符号，也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春节作为非遗品牌走向全球，不仅成为中华文化“出海”的鲜活样本，更在建构文化认同、促进文明互鉴、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彰显出多重价值意蕴，进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方案。

■ 坚定文化自信，夯实中华文明传承传播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更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指引了方向。海外侨胞是把春节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的天使使者，也是推动中华文明海外传承的核心群体。

一方面，海外侨胞以春节庆典为节点，在一系列共同活动中形成由交际网络连接起来的“社会空间”。在春节庆典这一文化媒介的连接下，不同阶层、不同代际的侨胞形成了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与社会属性。这种文化归属不仅助力个体在更广阔的交往中实现社会化，还进一步强化了侨胞群体的社会联结与整体凝聚力，成为维系文化根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纽带。

另一方面，海外侨胞将春节文化作为精神资源，基于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构筑起“文化空间”。春节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家园”模式的空间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民族成员在经历了跨文化适应后，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保持与肯定。非遗春节品牌的海外传播与代际延续，能够助力侨胞增加对自我、族群身份认同的自信与底气，也让他们找到情感共鸣和精神依托，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

■ 融合多元文化，促成文明交流互鉴和合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强调“共建文明百花园”。非遗中国年的“出海”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开拓了有效路径，也有助于推动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繁荣兴盛。其深刻诠释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核心理念，是全球文明倡议的生动实践。

一方面，春节“出海”后历经“移植—解构—重建”的过程，不再局限于单一民族或地域文化的范畴，而是呈现出一种跨民族、跨地域的文化融合态势。文化融合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或替代，而是在尊重和理解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开展的跨文化深度交流与互鉴。品牌共同体的塑造不仅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创新转化与现代价

值，更助推了春节文化从华人族群向地域共有文化的转变进程，从而形成世界人民的集体记忆。非遗中国年的海外创新实践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又以开放姿态吸纳多元文化元素，使春节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化共鸣载体，旨在寻求价值共识与利益共赢。

另一方面，以春节庆典为黏合剂的公共空间构筑，有益于不同国家人民逐步消除文化隔阂和误解，增强民心相通相亲，助推人类文明进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与发展，中华文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向现代转型，而海外春节庆典也愈发多面向、多维度地呈现出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之道。走出国门的春节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意义共创”，促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在情境体验中感知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多元和合”的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而非遗春节品牌的全球传播正是以多样性为前提、以交流为路径、以互鉴为目标，有力地推动着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发展。

■ 凝聚全球共识，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非遗中国年的全球传播是以文化交融共进为引

擎的实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积极动能。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文化以全新姿态彰显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在全球范围内凸显了深远的文化内涵与世界价值。

一方面，非遗春节的精神内核赢得情感认同与价值共识。春节作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生生不息”的生命观、“团圆与分享”的普世情怀与“和平与祈福”的共通追求。这些文化基因通过代际传承与创新发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在现代社会中展现出强大的时代生命力。特别是春节的价值理念契合人类共同价值，引发了全球民众的价值共鸣，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另一方面，非遗春节的品牌效应促成机遇共享与利益共赢。春节已经在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高认可度的节庆品牌效应，形成“文化传播—经济效益—社会认同”良性循环。其“民间性”特征为国家间人文交流提供了灵活路径，通过“文化先行、合作跟进”的模式，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的外交理念，这不仅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者分别为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理工大学基地研究员，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TJSR20-002 之阶段性成果)

以改革创新引领国有企业走出内卷式竞争

高楠 秦鹤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更好地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摆脱低水平重复和内卷式竞争，实现内涵式增长，发挥引领整体经济转型发展的使命责任。

从实践来看，所谓“内卷式竞争”并非竞争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发展方式、竞争逻辑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出现了错位。摆脱内卷式竞争、走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就是要从深层次上不断推动竞争方式的转变，把改革创新贯穿发展全过程，从发展方式、运行效率、体制机制和产业协同等方面系统发力。

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先导，引导国有企业走出路径趋同的竞争格局。内卷式竞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发展路径高度相似。不少企业在业务布局、项目选择和投资方向上相互模仿，容易形成“你有我也有”的跟随式扩张，导致资源被分散配置，优势难以沉淀。

要破解这一问题，首先要从发展方式上作出根本性转变。国有企业要明确自身发展方向，自觉将发展重心放在提升内在效率和长期价值上，围绕自身功能定位和比较优势，系统梳理业务结构和资源投向，把有限资源集中用于关键业务和核心能力建设。

除此以外，还要强化政策引导和机制保障。政府部门在国资监管、考核评价中要推动优化导向，淡化规模增速等短期指标，突出质量效益、创新能力、战略贡献等核心维度，引导国有企业在投资决策和项目布局中锚定长期价值，聚焦提升单项业务的运行质量、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以提升运行效率为重点，重塑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和管理能力。内卷式竞争往往伴随着效率不足。当企业主要依靠追加投入来维持增长时，边际效益递减不可避免，内部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会被不断放大。

破解效率困境，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创新和重塑企业运行机制。一方面，要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系统优化业务链条和管理环节，精准识别并剔除不产生价值的冗余流程、重复操作，让资源配置始终贴合核心业务需求与客户价值诉求。通过持续迭代优化、压缩无效消耗，把有限资源集中投向产品升级、服务提质等关键领域，实现“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价值”的管理目标。另一方面，则是要加快运用

数字技术和现代管理工具，提升管理的精细化和透明化水平。依托数字技术构建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闭环体系，用数据穿透部门壁垒、还原业务真实场景，让决策摆脱对个人经验的依赖，实现精准化、科学化管控，同时以标准化流程固化每一次改进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运行规范，让效率提升成为企业内生、稳定的能力，而非依赖短期突击或额外投入。

以体制机制优化为支撑，增强企业持续创新和自我迭代能力。内卷式竞争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创新动力不足。若企业的激励机制仅聚焦于短期业绩兑现，而非长期能力建设和模式突破，就容易使企业陷入“重模仿、轻创新”的短期竞争，难以沉淀核心技术与可持续优势。

因此，要推动国有企业走出内卷，必须在体制机制上精准发力，激活创新与迭代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要构建与高质量发展适配的考核评价体系，重点突出创新投入强度、关键技术突破、成果转化效率、长期价值沉淀等指标权重，将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创新团队建设、颠覆性技术探索等纳入考核加分项，引导管理层把精力从“追逐短期业绩”转向“积累核心能力”。同时，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创新容错纠错机制，为创新试错提供宽松环境。

另一方面，则要在严守监管底线、压实主体责任的前提下，深化授权、放权改革，赋予企业在创新项目立项、研发投入、团队激励、成果转化等方面更大的决策自主权。通过“权责对等”的机制设计，搭配数字化工具打通创新从研发、试验到产业化的全流程管理，让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创新策略，形成“创新—迭代—增值”的良性循环。

以构建协同格局为导向，推动竞争方式由“内耗”走向“共赢”。内卷式竞争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协同意识的缺失与资源配置的碎片化。企业之间的各自为战、盲目布局，不仅会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还会因无序竞争拉低产业链整体运行效率，难以形成应对市场竞争和技术变革的合力。

要引导竞争走向健康有序，需要打破“零和博弈”思维，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构建协同发展生态。一方面，要以产业链、价值链整体价值最大化为导向，引导国有企业立足自身功能定位与比较优势，明确在产业链中的分工边界，聚焦自身核心价值创造，提升产业链整体协同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数字化工具为支撑，搭建跨企业协同平台，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打通技术、数据、服务等资源的共享通道。通过统一数据标准、共建技术研发平台、开展联合攻关，破解“数据孤岛”“资源壁垒”等问题，让创新成果、优质资源在产业链内高效流动，引导企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

当竞争的核心从“规模对冲、相互消耗”转变为“能力互补、协同增值”，不仅能减少内卷式消耗，更能通过产业链协同放大整体效应，推动行业发展质量与核心竞争力同步提升。

(作者分别为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讲师；均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双向混改”中多个大股东治理结构的形成逻辑及共同治理机制研究”(21BGL1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高校思政课讲好天津故事的叙事逻辑与实现路径

杨静逸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天津故事作为中国故事的缩影，以其与世界文明共鉴的开放气质、与民族精神共频的价值追求、与国家命运共振的历史文脉、与党的征途共进的信仰根基，成为生动阐释“何以中国”的重要窗口。高校思政课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场域。通过思政课讲好天津故事，引导大学生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生动实践深刻认识中国故事背后的道理，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和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重要指示的具体实践。

坚持“内容为王”：以津派文化为根，打造“四美”叙事文本。思政课讲好天津故事的本质是要通过天津故事的独特风采，深刻阐释中国故事背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华文化之“道”，引导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四个自信”。其中，文化自信作为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决定人选择什么信仰的根本。因此，思政课讲好天津故事，首先要坚持“内容为王”，以津派文化为根，打造“四美”叙事文本，通过讲好津派文化故事，让学生读懂天津“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的新实践，进而引导学生从津派文化的丰厚叙事中深刻理解“何以中国”的文化底蕴。一是打造“古今贯通之美”叙事文本。通过讲述“杨柳青的砖雕、金汤桥的钢索、大沽口的炮台、觉悟社的青砖”让学生触摸历史文脉，讲述“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周恩来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范旭东的‘倡办实业救亡图存’”，让学生

探寻民族精神，引导学生在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叙事中感受天津“古今贯通之美”，深刻认识心怀“国之大者”的时代意义。二是打造“中西交汇之美”叙事文本。讲述五大道小洋楼、意式风情区建筑背后的天津故事，让学生在直观感受西方建筑与津门故里交相辉映的“中西交汇之美”的同时，从建筑文化叙事中深刻认识中西对话的世界格局。三是打造“开放包容之美”叙事文本。讲述从漕运枢纽、通商口岸到天津港发展的历史变迁，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城市文化叙事，以及“五型”开放战略擘画的新时代对外开放叙事，让学生在感受天津“开放包容之美”的同时，从河海文化叙事中深刻认识和合共生的价值底色。四是打造“与时俱进之美”叙事文本。讲述新能源技术、脑机接口、水下智能装备等天津新质生产力发展故事，以及杨柳青木版年画、面塑、“狗不理”包子制作技艺等国家级非遗的文化发展传承故事，让学生在感受天津“与时俱进之美”的同时，深刻认识创新成果惠及民生的实践导向。

坚持“话语为桥”：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核心，锻造“三新”叙事话语。思政课讲好天津故事的叙事文本，要通过教学实现“入脑入心”的目标，就要坚持“话语为桥”，以中国话语教学化展现的标准，锻造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核心的“三新”叙事话语。一是以新时代“马言马语”坚守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是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的过程。思政课讲好天津故事，首先要置于中国故事天津样本的话语框架，以“中国梦”“现代化强国”“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时代的

让更多企业在新领域新赛道跑出加速度

郭贝贝 陈锦澳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分论首位，强调“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独角兽企业”。这是继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等创新型企业家国家战略框架之后，再次从国家层面针对创新型企业家作出的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创新型企业家培育与发展进入体系化、精准化新阶段。与此同时，2025年底的天津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持续提高发展含‘新’量、含‘科’量、含‘金’量、含‘绿’量”，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因此，未来迫切需要顺应新一轮技术变革与产业革命趋势，让更多企业在新领域新赛道跑出加速度。

创新型企业家是引领新经济、开辟新赛道的主力军。从战略定位来看，创新型企业家是新经济发展范式转型的核心引擎。创新型企业家往往聚焦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等前沿领域，以高强度研发投入推动技术从0到1的原始创新，成为承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力量。创新型企业家不仅提供新技术，更通过技术渗透与融合，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催生新环节、新业态，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环节跃升。在全球经济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趋势下，创新型企业家也通过掌握核心知识产权、参与或主导国际标准制定，不断提升国际分工的核心地位，成为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重要变量。

从驱动机制来看，创新型企业家是新经济产业形态变革的核心主体。一是前沿技术的率先突破者。通过构建高效的研发体系，持续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迭代升级，形成坚实的技术壁垒和持续的创新流。二是新型商业模式的开拓者。善于将

技术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催生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订阅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颠覆传统行业的价值创造与分配逻辑，创造全新市场空间。三是协同创新生态的赋能者。通过技术外溢和产业关联效应，形成以创新为导向的产业生态圈和产业集群；同时，通过构建或融入多元主体的创新生态网络，形成协同研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开放式创新共同体。

从功能定位来看，创新型企业家呈现出明显的功能互补与梯队特征。根据创新能力、成长阶段与规模体量的差异，创新型企业家可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处于初创成长阶段，专注于深耕细分市场，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特征。第二类是瞪羚企业，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在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上取得突破，特点是增长速度迅猛、创新能力强劲、市场前景广阔。第三类是独角兽企业，成立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未上市，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和指数级的增长潜力。第四类是科技型领军企业，处于成熟发展阶段，在技术创新、市场影响力、产业引领及全球竞争力等方面处于行业顶尖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聚焦创新型企业家加强政策精准支持与创新机制保障。一是完善创新型企业家梯度培育体系。遵循创新型企业发展规律，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扶持，帮助其实现从初创到成熟、从技术到市场、从隐形冠军到行业龙头的跨越，形成层层递进的创新型企业家群落。要重点培育高科技型领军企业、独角兽企业，支持瞪羚企业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领域上要巩固壮大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绿色石化、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循环经济等

重点产业。服务上要建立创新型企业家动态培育库，对入库企业进行分级扶持，实施“一企一档一策”跟踪管理。

二是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在科技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均发挥主体作用，其科技创新活动贯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的全链条。要重点强化企业创新决策权，建立由企业牵头凝练提出国家科技计划中产业应用项目的形成机制，鼓励支持企业牵头联合产学研用各方，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要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密切合作，面向产业需求联合科技攻关，围绕企业需求强化人才培养，依托共建平台开展技术孵化、实验验证与成果转化。

三是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融通发展并非简单的合作发展，是以市场、资本、技术、信息等互通共享为基础，提高整体创新效率、产业链韧性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融合发展模式。这就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在机制创新和生态培育上下大功夫。政府要做好科学指引，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各类大型科研设备，服务大中小企业联合申报国家项目。同时，也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由“链长”企业主动开放资源，专业服务机构做好高效服务供给，共同营造良好协同生态氛围，形成融通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

四是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目的在于通过促进人才、资金、技术、数据、平台等创新要素集聚，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要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承担更多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原则，加强科技金融支持力度，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要重点破解制约企业创新人才的问题，完善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完善企业海外引才机制及其政策便利化服务，同时，大力培养创新型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作者均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